

(文章编号) 1002-2031(2013)01-0062-07

城市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云南省为例

王智勇

(摘要)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间的影响机制却颇有争议,分歧主要源于数据差异,也与地理单元和空间密切相关。以云南省县域经济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采用空间经济计量学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以城市和距离为基本因素的区域分类体系,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县域经济的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但是在不同的县域,两者的关系有显著的差异;只有当城市化率达到 21.5%,城市化才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仅有昆明市及少数较大州级市及周边县域,它们的城市化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关键词) 城市化;经济增长;云南省;县域;区位

(中图分类号) F299.277.4 **(文献标识码)** A

在我国,就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东部地区远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在当前区域差距越来越大的形势下,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行研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现有的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基于省级数据,极少运用地级市数据,更缺乏基于县级数据的研究。考虑到省内区域经济的差异非常显著,故而深入到地级市甚至县级数据来探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本文选取云南省县域经济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县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试图论证二者关系的阶段性,即在不同的阶段,两者的关系会有所不同。本文首先阐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

之间的密切关系,再针对云南省县域经济加以区域划分,突出城市对县域经济的影响,进而设定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回归模型,采用 GLS 回归方法进行运算,在回归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提炼出二者关系的核心论述,最终提出政策建议。

一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城市化本身可能并不导致经济发展,但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城市化^[1],而且城市化形成的过程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2]。通常有两种相互关联的模型来解释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是以哈罗

(作者简介) 王智勇(1975—),男,汉族,江西会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收稿日期) 2012-07-08

(修回日期) 2012-09-14

德—多玛和以新经济地理学为代表的静态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了技术变革和生产率差异将导致资源从农业或内陆区域向城市或核心区域转移;另一种是增长模型,例如亨德森(Henderson)等人的城市增长模型,强调了在一个内生增长环境下,一国或地区从农业起步,达到一个时点后城市化进程开始,而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将逐渐形成城市体系^[3]。该增长模型的隐含条件是国民技术水平的进步,使得从农村中释放的劳动力可以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

针对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关系,已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研究,一些观点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例如,雷诺德(Renaud)在对111个国家分析后发现,一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紧密相关^[4]。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的早期研究也表明,在城市化率达到60%之前,很少有国家的人均GDP能达到1万美元。不过,有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但从累积效应来看,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也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5]。可见,关于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研究,依然有争议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与研究中所用的数据有关,特别是与所用的地理单元和空间位置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对地理单元的划分,把地级市和县级单元纳入分析框架。此外,还应该考虑地理和交通因素,对西部地区而言甚至还应该把民族和边境等因素考虑在内。本文试图将地理单元细化到县级,结合影响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其他因素,并考虑空间经济计量学中关于地理质心和距离的要求等进行研究。

二 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密切联系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现代经济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变动,或者说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即从以农业为主导到以工业为主导,再到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渐进演变过程。我国自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渐进演变。

城市化与工业化密切相关,但在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关系会有所变化。根据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

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率共同处于13%左右的水平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率^[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往往是在城乡分割的背景下进行的^[7]。这样的一种状态导致了我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这一点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各地的统计数据中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除此之外,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城市化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已有事实表明,人均GDP与城镇化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城镇化也会相应地上升,反之亦然。但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往往需要把二次项甚至三次项加上。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都有过一段依赖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即工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程度也越高,而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第三产业逐渐发展壮大并取代工业化而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工业化是当前我国大多数地区发展经济和提高城市化的最主要手段。

如前所述,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可以从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由于受传统的计划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第二产业的地区分布相当不平衡,东北三省和少数内地省份承担了重工业生产基地和主要的矿产资源采掘基地等角色^[8]。与此同时,沿海各省的第二产业受到较严的控制。不仅如此,传统的计划体制还极大地压制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只是有计划地供给一些重工业发达或轻工业聚集的省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各省在加快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不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其他诸如户籍制度等外生因素。

三 云南省城市等级与区域划分

在分析县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过程中,本文考虑了城市体系以及城市的辐射范围,以符合空间经济计量学中关于地理质心和地理距离的要求。为了准确划分云南省不同县域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确定了云南省的城市等级体系,然后

确定了城市影响距离,从而可以得到城市影响的县域范围,把云南省的县域经济加以划分。这种区域划分基于城市化之上,并把城市当作地理质心,综合考虑其辐射范围,而且它测量了每个县域经济体的城市化进程。

每一个省的城市体系都是由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构成的。对于云南而言,昆明是云南省省会,而且也是最大的城市,在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中一

枝独秀。在很大程度上,不同城市体系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人口规模的差异。本文以 2000 年普查数据为基础,来确定不同规模的城市,并加以划分。根据“五普”数据,云南省除了昆明市以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都没有超过 100 万。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 17 个地级地区中,并非每个地区都设市,例如文山地区境内就没有市,州政府设在文山县(2010 年文山撤县设市)。

表 1 云南省城市等级体系

城市等级	城市名称	人口规模(五普数据)	城市特征
1	昆明	>200 万	省会城市
2	保山市、昭通市、曲靖市、大理市、楚雄市、个旧市、景洪市、玉溪市、泸西市、思茅市、宣威市	10—90 万	地级市或者州政府驻地市及小城市
3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临沧县、文山县、中甸县、泸水县、瑞丽市	<10 万	州政府驻地县
4	所有其他县		远离城市

考虑到不同城市的影响范围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设定省会城市的影响距离为 50 公里,地级市、县级市及州政府驻地县的影响距离为 40 公里。也就是假定,在这一距离范围内的劳动力有可能会到城市就业,从而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本文将云南省全部县域划分成四类县域:昆明及其周边县区,这是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地级市或州政府驻地市及周边县区,这是主要受地级市影响的区域;小城市或州政府所在县及周边县,这是以小城市及州政府驻地县为核心的区域;边缘县,这是没有受到任何城市或州政府驻地县影响的县域,它们几乎没有受到城市化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区域划分的合理性,可以用县域社会经济数据来加以描述,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化和工业化等几个指标体系来衡量。

从表 2 可以看到,根据不同城市化程度来加以划分的结果在统计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而且呈现明显的规律,即越是靠近大城市的县市,人均 GDP 水平越高,城市化率也越高,而且人口规模越大。需要指出的是,县域经济发展也与县域面积密切相关,从表 2 中可以注意到,越是靠近大城市的县市,它们的面积越小,相反,越是边缘区域,县域面积越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只有县域面积小,才更有可能处于城市辐射范围之内,更容易与城市形成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表 2 中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依据不同城市等级进行的区域分类实际上反映了区域的城市化程度。因此,可以利用这一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影响。

表 2 云南省县域经济分类比较

年及区位	人均 GDP (元)	城市化率 (%)	GDP 二产比例 (%)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
2000					
1	7975.00	23.80	42.27	1384.40	43.96
2	5409.05	16.32	30.04	2646.98	37.61
3	3322.67	15.43	27.27	3346.86	26.92
4	2609.35	10.56	24.57	3366.69	28.99
2010					
1	25885.16	23.09	46.65	1384.40	65.54
2	16315.69	15.59	41.03	2646.98	41.40
3	13580.68	16.80	34.15	3346.86	32.25
4	10163.36	10.39	35.30	3366.69	31.00

四 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在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通过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会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通过人口的积聚,特别是人才的积聚、人力资本的提高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城市化总是通过城市化率的提高来体现,而城市化率提高的过程中,各种促使城市化率提高的因素也会相应地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除了城市化以外,还有很多因素都会起到影响作用。在区域经济研究中,通常把产业结构、投资、人口以及交通状况纳入区域分析的框架之内。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地处西南腹地的云南省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统计数据表明,云南省当年的各项指标都运行良好。因此,2008年对于云南省经济发展而言,很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契机。在模型中,本文把2008年前后的状况进行了对照,设定了时间虚拟变量。

为了深入探究县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利用统计数据来进行回归分析,并进一步检验影响县域经济的各种因素,即产业结构、区位、交通、投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对区域差距形成的作用。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汉族人口比例数据来自“五普”数据。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距在相邻年份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故而采用了间隔几年的数据,即2000、2005、2009和2010年的云南省县市人口社会经济数据。云南省共有一百多个县市区,故而四年的数据量为回归分析提供了足够多的样本量。但另一个方面也给数据的整理带来较大麻烦。由于未能找到每个县市的GDP缩减指数或物价指数,经济数据均以名义价格给出,未能扣除物价因素。尽管如此,在全省范围内采用统一的价格来衡量并不会显著地改变县市经济格局,也就是说价格因素虽有影响,但并不具有本质效果,而名义GDP水平和投资水平在各个县市之间的横向比较也有其合理性。

假设一个县市的产出主要是由劳动力和资本来决定的,同时该县所拥有的资源和产业结构也会对产出有着显著影响,则有方程(1)如下:

$$Y_i = f(Ur_i, A_i, K_i, L_i, \delta_i) \quad (1)$$

式中, Ur 表示县市城市化率, A 表示县域面积,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县市资源, K 为资本, L 为劳动力,式中最后一项代表影响产出的其他因素,包括产业结构和交通条件等。以方程(1)为基本框架,可以有基本回归方程(2)如下:

$$\ln y_i = \alpha + \beta_1 Ur_i + \beta_2 \ln A_i + \beta_3 \ln Sr_i + \beta_4 \ln Tr_i + \ln I_i + \chi_i \quad (2)$$

式中, y 表示人均GDP, A 表示县市面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县域资源(假设面积越大,资源越多), Sr 表示第二产业比例, Tr 表示第三产业比例,这两个比例用来代表县域经济结构, I 表示投资,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最后一项是其他因素,主要是指交通、民族、时间和边境虚拟变量。

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GDP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例如,周一星利用1977年世界上15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对数关系^[9]。此后的学者们通过大量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可以把另一模型设定为:

$$Ur_i = \alpha' + \beta'_1 \ln y_i + \sum \beta'_i X_i \quad (3)$$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公路、铁路和机场的分布分别以虚拟变量的方式纳入回归方程之中。通过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可以很方便地把公路和铁路交通图与行政区划图层叠加,从而确定公路和铁路线是否经过某个县市(用0和1来表示)。同样,利用ArcGIS可以提取各县市的面积,用以衡量县域经济的资源状况。利用2000年的“五普”数据可以计算各县市汉族人口的构成,用以表达县市人口的民族构成。尽管随着时间的变化,民族人口构成会有变化,但这种变化非常细微,因此可以用这一比例来代表各县市的民族人口构成。

表3的面板回归采用了GLS回归法,综合考虑了数据之间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并加以克服。模型1、2和3用来分析城市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模型3中采用了地均GDP来衡量县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同样衡量了城市化程度的区位对经济增长也有影响,其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表明越是靠近城市的县市(区域分类值越小),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也就是说,不同的区位对于县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越是区位良好的县域,经济增长水平越高。

表 3 城市化与县域经济增长 GLS 回归

	(1)	(2)	(3)	(4)	(5)
	Ln(人均 GDP)	Ln(人均 GDP)	Ln(地均 GDP)	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	0.022 (13.47)**		0.011 (5.19)**		
区位		-0.070 (3.70)**			-0.864 (5.51)**
Ln(人均 GDP)				4.736 (11.17)**	
Ln(GDP)			0.612 (2.83)**		0.612 (2.83)**
Ln(面积)	-0.128 (5.25)**	-0.177 (5.29)**	-0.762 (26.25)**	-1.821 (4.85)**	-1.723 (4.95)**
Ln(GDP 二产比例)	0.578 (14.44)**	0.704 (16.13)**	0.474 (10.46)**	0.656 (1.06)	2.787 (7.18)**
Ln(GDP 三产比例)	0.406 (5.76)**	0.708 (9.66)**	0.150 (2.00)*	1.780 (1.88)	4.905 (7.55)**
Ln(固定资产投资)	0.148 (14.63)**	0.146 (13.19)**	0.285 (22.83)**		
2008 年	0.498 (22.36)**	0.418 (19.08)**	0.377 (14.43)**	-4.629 (10.80)**	-1.650 (7.97)**
Ln(汉族人口比例)	0.085 (4.79)**	0.050 (2.19)*	0.360 (15.85)**	-0.404 (1.63)	-0.972 (3.67)**
公路	0.101 (3.71)**	0.111 (3.21)**	0.183 (5.87)**	-0.326 (0.84)	0.420 (1.36)
铁路	-0.013 (0.36)	0.068 (1.67)	0.127 (3.42)**	2.525 (3.55)**	4.071 (7.88)**
机场	-0.165 (3.65)**	-0.053 (0.98)	0.336 (5.59)**	7.700 (7.71)**	7.946 (9.45)**
边境	-0.052 (1.82)	0.042 (1.09)	-0.194 (4.45)**	4.128 (8.12)**	4.777 (11.72)**
常数项	3.904 (9.98)**	3.434 (7.69)**	3.226 (6.94)**	-21.520 (3.52)**	-3.967 (0.93)
样本量	498	498	498	500	500
县区市数量	125	125	125	125	125

注: 括号内为 Z 统计量的绝对值; * 为 5% 显著水平; ** 为 1% 显著水平。

此外还可以注意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也有许多呈现显著效果。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印证了投资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需要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在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人均 GDP 的影响非常显著。投资带动区域经济转型,这跟中国所有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大致相当。对于西部省区而言,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更依赖于投资的推动。

还可以看到,交通条件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公路对人均 GDP 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云南省缺乏铁路有关,表明在云南省的县域经济发展中,公路交通是最重要最现实的运输方式。在工业化进程中,交通显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料、材料、设备以及产品的运输都

需要依赖良好的交通条件,而且人员的流动也与交通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交通条件良好的县市容易获得资本的青睐。

2008 年金融危机对于云南省县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在 2008 年之后,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但金融危机对于城市化的作用却恰好相反,延缓了城市化进程。此外,汉族人口比例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是一种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却是显著的延缓作用。可见,金融危机和人口的民族构成对于云南省县域经济而言,在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影响。

模型 4 和 5 表明,就城市化而言,第三产业的作用要大于第二产业。其原因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云南省第二产业的发展有其比较特殊的地方,一些行业(如烟草加工、茶叶加工以及矿产加工等)并不在城市地区进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脱节。

由于投资和产业结构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都有影响,可能会模糊县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而且,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可能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S”型的曲线关系^[10]。因而在回归分析时有必要加入二次项和三次项,以便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基于这些考虑,本文采用另一种回归分析框架,即不把投资和产业结构纳入进来。

表4的面板回归采用了GLS回归法,综合考虑了数据之间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并加以克服。从表中可以看到,县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一方面存在显著而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影响的模式又略

表4 云南省县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1)	(2)	(3)
	Ln(人均GDP)	Ln(人均GDP)	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	0.129 (12.86)**		
城市化率平方项	-0.003 (8.36)**		
城市化率立方项	0.000 (6.32)**		
Ln(面积)	-0.050 (1.71)	-0.168 (4.46)**	-1.900 (5.81)**
2008年	0.926 (35.30)**	0.882 (29.49)**	-3.121 (9.35)**
Ln(汉族人口比例)	0.096 (4.60)**	0.033 (1.14)	-0.669 (2.98)**
公路	0.143 (4.49)**	0.104 (2.67)**	-0.462 (1.43)
铁路	0.131 (3.04)**	0.267 (5.10)**	3.520 (5.63)**
机场	0.034 (0.63)	0.429 (7.06)**	8.667 (11.46)**
边境	-0.212 (5.11)**	0.091 (2.04)*	4.889 (10.77)**
区位		-2.022 (3.85)**	
区位平方项		0.746 (3.21)**	
区位立方项		-0.092 (2.94)**	
Ln(人均GDP)			79.416 (1.99)*
Ln(人均GDP)平方项			-10.005 (2.14)*
Ln(人均GDP)立方项			0.432 (2.38)*
常数项	7.127 (26.77)**	11.182 (25.40)**	-190.250 (1.68)
样本量	500	500	500
县区市数量	125	125	125

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的绝对值;*为5%显著水平;**为1%显著水平。

有差异。在模型1中,城市化率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显著,但系数有正有负,表明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进一步的计算结果表明,当城市化率超过21.5%时,城市化率对人均GDP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城市化只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对县域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在模型2中,区位的各项指标都很显著,表明根据区位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模式。进一步的计算结果表明,当区位值小于1.12时,区位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显著的促进效果,这意味着昆明和某些较大的地级市及周边区域,县域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县区。由此可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阶段性。在模型3中,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也都显著,但显著程度有所下降,这表明经济增长对于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不如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种格局的形成可能与云南省的产业结构有关,许多县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一些。

类似地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和民族人口构成对于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是一种明显的延缓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与云南省的民族政策有关,即越是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区域,越是人为地建立城镇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 结论与建议

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基于对云南省县域经济的分析可知,城市化有效地推动了县域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会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与大多数的研究基本一致。但相比之下,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这与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整体上还处于起飞阶段有关。

云南省各县域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非常悬殊,而要实现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城市化水平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或者说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阶段性。计算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21.5%及以上时,城市化会对县域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通过区位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分析表明,仅有昆明及少数地级城市及其周边的县域实现了城市化与县域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大多数其他

县域,由于城市化水平很低,并没有起到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些县域的经济发展有待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云南省的城市化现状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故而不利于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的县域经济受到城市体系的显著影响,不同规模的城市对于周边县域的影响有着明显差异。越是规模大的城市,越能够影响其周边的更多县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区位对于县域经济的影响非常显著,越是靠近大城市的县域,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率也越高。因此,要促进云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大力发展城市体系,建立更多的城市,通过发展交通来扩大城市的辐射范围,以促进对于城市周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更要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借此过程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在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远快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形下^[11],西部地区更应该在城镇化方面努力追赶东部地区,通过城镇化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从而有效地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云南省应该大力发展现代工业,以促进工业化进程,推动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机制的形成,从而使得两者实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发展需要不断地吸纳农村劳动力,从而不断地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也会随之跟进。

【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re are disputes concerning affecting mechanism, which needs to be studied further. Part of the disputes come from data difference and relate to geographic unit and space. This essay focuses on county economy of Yunnan Province,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t county level, especially for a western province with multi-nationalities. Within a framework of spatial econometrics, this essay constructs a regional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cities and distance. Besides, it emphasizes on geographic features and location. Regression shows that there is a rather clos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which depends on developing stages and locations. Only for those counties whose urbanization rates are over 21.5%, urbanization will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distinctively. While only for those counties which are around Kunming and some large cities, urbanization will definitely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Yunnan Province; counties; location

参考文献

- [1] Renaud, B. National Urbanization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 - 18
- [2] 施建刚, 王哲.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 城市问题, 2011(9): 8 - 13
- [3] Henderson J. V., H. G. Wang. Aspects of the Rural -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Countr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5(5): 23 - 42
- [4] Henderson J. V. Cities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0(1): 515 - 540
- [5] Henderson J. V.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o - What Ques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3(8): 47 - 71
- [6] 钱纳里. 发展型式(1950 - 1970) [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 [7] 陈钊, 陆铭. 从分割到融合: 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 [J]. 经济研究, 2008(1): 21 - 32
- [8] 范剑勇, 朱国林. 中国地区差距演变及其结构分解 [J]. 管理世界, 2002(7): 37 - 44
- [9] 周一星. 城市地理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0] 孙文凯.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兼评中国特色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4): 33 - 40
- [11] 沈建法. 1982年以来中国省级区域城市化水平趋势 [J]. 地理学报, 2005(4): 607 - 614

(编辑: 王明哲; 责任编辑: 李小敏)